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应对理路

徐益亮¹ 路丙辉²

(1.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2.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是通过对话语的调整与修饰, 以实现思想掌握群众的语言艺术方式。话语修辞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感染力、说服力和有效性, 在促进适切地达意传情、有力地说服教育、深度参与人的精神建构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然而, 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活动中, 常会遇到诸如修辞幻象与话语失真、言难尽意与话语隔阂、修辞悖论与话语遮蔽等困境。对此,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要以事实为底线, 以理性为主导, 以存其“真”; 克服言意矛盾, 消解语言冲突, 以去其“隔”; 坚持修辞明理, 促进话语融合, 以降其“蔽”。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修辞; 表达; 理解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3)11-0044-08

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掌握群众的活动, 同时也是运用语言教育人、引导人、说服人、塑造人的过程。作为语言表达的艺术方式, 话语修辞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感染力、说服力和有效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背景下, 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不断加重,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艺术化的吁求愈发强烈,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的关注度也随之与日俱增。当前, 在学界同仁的努力下,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正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新论域, 其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研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 本文尝试在厘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价值意蕴的基础上, 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的价值意蕴

话语修辞广泛存在于人们的各项语言活动中, 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实践证明, 思想政治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掌握群众的深度、广度和效度, 往往与话语修辞艺术的掌握和恰当运用紧密相关。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通过对话语的合理调整与修饰, 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适切地达意传情、有力地说服教育、深度地参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

(一) 思想政治教育在话语修辞中完成达意传情

语言是应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达意传情之交流需要而产生的, 是人与人之间表达思想、交流感情、相互沟通的主要工具。人们通过语言, 在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中理解世界、理解彼此。思想政治教育是

路丙辉: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诠释研究”(项目编号: 22YJC710078)、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政课建设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安徽师范大学)”(项目编号: 21SZJS34010370)阶段成果

一种语言性很强的社会实践活动,没有语言,思想政治教育将无法获得其存在的基本形式,无法阐释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难以向受教育者表达思想感受,并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接受。然而,普通的语言符号恐怕难以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丰富多样的价值期待,而修辞性话语则使之成为可能。有效地表达思想感情以促进理解,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的基本旨趣和修辞话语的基本功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1]392}话语修辞有利于增强表达的准确性、适应性、亲和力、感染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接受效果。针对比喻修辞格的表达功能,中国心理学家陈大齐曾指出:“今有一事物或一种道理于此,欲加以说明或论证,专就这件事物或道理来说,恐怕说不明白,说不深刻,于是借另一种事物或道理来比况,使他人听了可以理解得格外明白而深刻。”^{[2]75}教育者根据不同的受教育者、受教育者的不同需求以及特殊语境,通过对话语的调整与修饰,强化话语表达的功能,能够更加准确、适切、恰当地向受教育者表达思想观点,有亲和力、感染力地传递情感态度,有助于在受教育者那里产生教育者所期望的认知和情感效果。例如,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这样说道:“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3]习近平通过运用引用、隐喻、对比等修辞手法,极大地增强了话语的适应性和表达力,巧妙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形象地诠释了中国和平、可亲、文明的形象,适恰地传递了中国梦的世界价值。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语言是一种最精细、最锐利的工具,我们的教师应当善于利用它去启迪学生们的心扉。”^{[4]9}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只有掌握和运用高超的语言艺术,把思想政治教育从一般性的话语活动提升到一种话语修辞的艺术层面,使用精准有效、形象生动、切题适境的话语,才能在受教育者那里启发理解、激活想象,真正实现彼此的心灵沟通,达到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效果,使马克思主义科学道理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 思想政治教育在话语修辞中实现说服教育

在修辞学界,尽管对修辞的定义五花八门、莫

衷一是,但作为“说服的艺术”却得到修辞学家们的普遍认可。法国修辞学家巴利在《语言活动和生活》中指出:“我们说话便是一种战斗。因为人间信念、欲望、意志,等等,都还不能完全吻合,这人以为重大的未必旁人以为重大,这人以为轻微的未必旁人以为轻微,因此每有两人接触,便不能不开始所谓言辞的战斗,运用所谓言辞的战术。”^{[5]150}在人类的博弈中,当人们意识到说服可以超越暴力、强制等手段以影响和协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时,修辞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6]171}在古希腊智者学派那里,修辞术受到了极大的推崇,高尔吉亚、伊索克拉底和普罗泰戈拉等都曾开设过修辞学校,专门传授说服方法与技巧。在古代中国,则形成了以说服、劝谏君王为主要目的的话语修辞艺术,产生了孟子、荀子等一大批说服教育家。许多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又何尝不是一种思想博弈呢?思想政治教育要想思想掌握群众,把思想理论变成物质力量,首先就要说服群众。在多元价值观相互激荡和意识形态斗争异常激烈的当今时代,要想说服群众,仅仅依靠真理本身是不够的,因为彻底的理论并不意味着彻底的说服,从理论彻底的“此岸”走向彻底说服的“彼岸”,还需要借助话语修辞这个有力的“船”和“桥”。作为“说服的艺术”,修辞被当作“大权在握、使人不能不从的王公,被描绘成口吐天宪、神通广大的女神,被讴歌为‘使饥渴难当的人感到精神饱满,哑口无声的人变得振振有词,双目失明者重见光明’的一种魔力”^[7],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强大的说服力。话语修辞使彻底的理论获得更加彻底的阐释。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不同的表达方式会产生不同的表达效果。话语修辞通过使用合理的话语策略和手段,可以使教育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以简洁、明晰、形象、具体的形式呈现在受教育者的面前。话语修辞使彻底的理论获得更加彻底的理解。彻底的理论只有获得彻底的理解,才能彻底地发挥作用。话语修辞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缩小人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心理和认知距离,促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把握与理解。话语修辞使彻底的理论获得更加彻底的捍卫。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关系重大。面对马克思主义遭受的各种误解、质疑、歪曲和攻击,话语修辞通过优化话语表达的方式,有利于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感召力、引导力、说服力,彰显其无可辩驳的真理力量。

(三) 思想政治教育在话语修辞中参与精神建构

语言不仅充当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得以充分开展的工具和有利条件,而且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家园。然而,符号学意义上的语言的思想教育功能和价值是较为有限的,而一旦进入话语修辞的境界时,语言就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力量。纵观古今中外修辞学家的言论,不论是西方古希腊的先哲、中国春秋战国的先贤,还是当代修辞学家,无不对修辞的巨大魔力充满敬畏,并报以源源不断的赞美之词。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比起采用不加修饰的话语形式,修辞话语可以获得更加完备的交际效果。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人精神世界的活动,因此要完成塑造人的精神的任务,就要把握和遵循人的精神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人的精神塑造的规律。当代西方修辞学大师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一种语言性的存在,更是修辞性的存在,因为“人一旦运用语言,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修辞环境”^{[10]16}。因此,人不仅以语言的方式,更以修辞的方式与人交流、理解世界,获得思想认知和价值观念。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只有掌握和运用好话语修辞艺术,才能更加有效地参与到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中去。王一川先生在分析伽达默尔晚年从语言性转向修辞性的诠释学时指出:“修辞指人为着感染他人、确立或改变自己在社会权力机关结构中的位置而有力或有效地运用语言(当然在语言的最广义用法上),这势必更注重语言活动中的扭曲、含混、破碎、掩饰、润饰等复杂因素。这既可以解决语言与‘生活世界’的复杂关系问题,又可以使一直未有着落的价值评价找到落脚点。”^{[19]211}修辞为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提供了一种审美化的认知方式,有助于使一定的思想价值观念更深地植入人的精神。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过程中,教育者通过对话语的调整与修饰,在话语中注入特定的认知、情感、价值,寄托某种价值期待。同时,受教育者在面对教育者的修辞话语时,必然会受到修辞话语中蕴含着的认知、情感、价值的影响,并作出相应的反应、判断和

选择,以回应教育者的价值期待。当教育者以修辞的方式将世界审美化,并且以此激活了受教育者的审美经验,激发了受教育者的审美情趣时,修辞便进入到了人的精神世界,参与到了主体的精神建构之中,而随着修辞话语以习惯的形式被凝固下来,修辞话语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核就会逐渐内化为受教育者的经验意识,并成为人们的行为向导。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的现实困境

思想政治教育要想讲好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使其为人们所易于理解、乐于接受,就离不开话语修辞的功夫。然而,修辞在施展其“魔力”的同时,也毫无保留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中制造了种种困境。厘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的困境有助于提升教育者话语修辞的自觉性和自省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的效果。

(一) 修辞幻象与话语失真

“修辞幻象”源于西方戏剧主义修辞批判理论,其基本内涵是语言制造出来的幻觉。美国当代传播学者鲍曼指出:“批评家进行修辞分析时应该从这样的前提出发:语与物之间出现差异时,理解事物的最重要的文化产物可能不是物或‘现实’,而是语言或符号。”^{[10]84}修辞话语所能提供人们的并非一个纯粹客观的世界,而是一个经过了重新编码、重组、包装了的象征性的世界。而当人们通过这种被重新编码、重组、包装过的语言形式来把握对象的时候,真实的对象往往就可能被提升、压抑或是置换、变形。这种由修辞性语言制造的对象,实际上是一种幻觉,即修辞幻象。修辞幻象不仅客观地,而且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修辞活动之中,当然也客观地、普遍地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之中。但关键的问题是,修辞幻象会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诚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修辞幻象具有双重效应。它既可以创造积极的修辞效果,又会带来消极的修辞后果。积极效果主要表现为教育者通过创造一个艺术化的对象,有利于触动受教育者,激活他们的思维、激荡他们的思想、激发他们的情感、激励他们的精神,引发合乎教育者意愿的话后行为。消极后果主要在于

造成教育者的话语失真以及由此给受教育者带来的虚幻认知和理性迷失。

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中,不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会产生修辞幻觉,被置于一种非真实的修辞世界之中。教育者往往会沉醉于自我建构的理想性幻象,造成话语失真;受教育者则会迷失于由教育者使用失真的修辞话语所建构的虚幻世界,进而以幻觉取代真实,甚至是无视或否定真实存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指出:“全部理论认知都是从一个语言在此之前就已赋予了形式的世界出发的;科学家、历史学家、以至哲学家无一不是按照语言呈现给他的样子而与其客体对象生活在一起的。”^{[11]155}修辞话语赋予语言的世界以审美化的构形,使语言描述的现实以非现实的幻象形式投射到主体的意识之中。特别是当信息不对称的时候,教育者利用其所控制的信息资源制造的修辞话语便会在受教育者那里产生修辞幻觉。由语言制造出来的修辞幻象取代了事实真相,它以幻觉的形式在人的主观世界中塑造出了一个看似真实却实为幻觉的、失真的世界图景。如果受教育者沉迷于教育者失真的修辞话语制造的幻觉世界,并以幻觉取代客观真实,这时的修辞话语实际上就充当了蒙蔽人的双眼、消解人的理性的工具,使人变成修辞的奴隶和缺乏主见的盲从者。

(二)言难尽意与话语隔阂

语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交流思想、沟通情感的主要工具。然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境又往往与语言息息相关。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指出:“语言的确是一种奇妙的、神通广大的工具,可又是一种不保险的工具。听话的人的了解和说话的人的意思不完全相符,甚至完全不相符的情况是常常会发生的。”^{[12]177}从语言表达与理解的角度看,言难尽意及由此导致的话语隔阂无疑是造成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相互隔离的重要因素。其实,话语隔阂不仅仅存在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即便是教育者本人,也很难保证自己的语言与思想完全一致,自我隔阂也是常有的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尽管人的行动是有意识的活动,但人们能够用语言明确表达出来的意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人们知晓但是无法言语的一种思想观念和内在意识。”^{[13]165-166}语言

一经诞生便产生了“尽意”的冲动,但困于自身的种种局限与矛盾,使其常常难以抵达所欲之“意”的彼岸。古往今来,言难尽意无不困扰着包括极善运用语言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在内的语言使用者。不论是“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14]205}的无奈,还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15]1619}的苦恼,无不表现了言难尽意的修辞困境。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总是试图有效地阐明和抒发一定的思想情感,而受教育者也希望能够理解和把握这些思想情感。但是,如果言不尽意的话,就势必造成教育者说不清、道不明,受教育者不知所云、不明所以的话语隔阂局面。

归结看来,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言难尽意和话语隔阂的困境主要在于3个方面的矛盾。第一,思想内容的丰腴性与语言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思想感情犹如一团难以名状的“星云”,这团“星云”以多维、立体的样态存在,因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需要借助语言使其条理化、明晰化。然而,不仅语言(尤其是口语)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是一维的、线性的,而且就连语言本身也并不比人的意念情思更为固定可靠,这就造成了语言与思想感情之间难以匹配的困难。第二,语言的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矛盾。“人们无法通过陌异性或私人性的语言进行沟通,也很难在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视域中深刻理解对方”^[16],也就是说,理解以使用共同语法规则及确定含义并蕴含人们共同心理体验的公共性语言为前提。然而,不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所使用的并非都是客观的公共语言,而是蕴含着言说者独特生存背景的个性化、私人性、专属性的语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一旦使用非公共性语言,理解就会立即遭遇困境。第三,语言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强调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然而,二者常常呈现出难以两全的困境。思想政治教育不把马克思主义科学道理的深邃性、深刻性和深厚性讲清楚、讲明白,便难以实现理论育人的目的,但是为了达此目的,教育者就不得不舍弃或部分舍弃艺术性话语,这极易把自己置于抽象思辨的境地。同样,为了追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形象性、生动性、直观性,教育者就不得不舍弃或部分舍弃话语的科学性,这就可能使思想政治教育陷入情绪化、肤浅化甚至娱乐化的泥潭。

(三)修辞悖论与话语遮蔽

修辞向人们打开了一扇窗,使得人们能够看到别样的风景,但也恰恰是因为这扇窗遮挡了人们对风景的欣赏。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17]301}。但是,作为“家”(house),语言既是存在的“家园”,也是存在的“牢狱”,即语言既可能使“存在”得以澄明,又可能把它隐藏起来、遮蔽起来。在涉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研究中,修辞的澄明功能备受关注,而其遮蔽功能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何谓修辞的遮蔽呢?这恐怕还得从理性话语和诗性话语这两种主要的话语修辞方式说起。苏联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指出:“作家和艺术家从整体上全面地圆满地把握现实,毫无割裂地、毫无分离地把握生动的现实。思想家则恰恰是把现实分割开来,并且仿佛以此消除现实,即把现实造成某种暂时的骨骼。”^{[18]632}思想家使用的是理性话语,追求的是抓住“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19]285},形成对事物“是什么”的本质把握与认识。而艺术家使用的是诗性话语,旨在通过沟通显现与隐蔽、在场与不在场的联系,以显现和在场的东西挖掘隐蔽和不在场的东西,来理解“显现的事物是怎样从隐蔽中构成显现与当前的这个样子的”^[20]。显然,理性话语与诗性话语是从不同的向度对事物作出各自合理的说明和诠释,但是理性话语和诗性话语各有其功能的阈限。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理性话语能够相对准确地向受教育者说明事物的本质,却难以帮助受教育者深刻理解和感受事物何以如此的道理。诗性话语能够帮助受教育者理解和感受事物何以如此的道理,但在向受教育者说明事物本质方面就显得勉为其难了。如果在话语修辞过程中偏执于某一种话语方式,就会导致教育内容被遮蔽的现象。

在逻辑理性思维还未真正建立起来的人类文明早期,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主要是诗性认识。但是,随着理性主义的崛起并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思想潮流,诗性认识逐渐被排除在科学视野之外,诗性话语逐渐成为理性话语的婢女。过去,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也存在过理性话语对诗性话语挤压的现象。近年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深入,诗性话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了追求更好的表达和理解效果,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倾向于选

择更富亲和力、感染力、形象性的诗性话语来替代朴素平实的理性话语。但是,应该看到,诗性话语在弥补理性话语不足之处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遮蔽。例如,对“爱情”的解释。相对于“爱情是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在各自内心形成的相互倾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一种强烈、纯真、专一的情感”^{[21]177}的理性表达,“爱情是美酒”“爱情是火焰”“爱情是赌博”等诗性话语无疑更能唤起人们强烈的情感体验与共鸣。但是,这种话语修辞在澄明爱情“怎么样”的同时,却对爱情“是什么”产生了新的遮蔽。在“爱情是美酒”的隐喻中,深奥的爱情本体被“美酒”这个形象的喻体所替代,而一旦“爱情”被纳入到“美酒”这个喻象结构中时,“爱情”的含义也随之偏离了其本身,成为主体转述话语中的存在。此时,人们不仅有理由对“权力亵渎真相”“意志掩盖事实”提出质疑,而且对于爱情到底是什么可能仍然存在模糊认知。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诗性话语的这种遮蔽性,孔子才对“巧言”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22]50};老子才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23]340}的观点;柏拉图才偏狭地认为,“修辞是语言的巫术,是使用巧言设计骗局和陷阱的手段”^{[24]45}。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经常使用诗性话语来增强表达的效果,但也要对其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和减少它的遮蔽效应。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困境的应对理路

应该看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的困境一方面来源于修辞本身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也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有关。因此,破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的困境,既需要着眼修辞本身,努力避免落入修辞的陷阱,也要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和学科特点,确保修辞话语既符合话语修辞的内在规律,又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与价值。

(一)“存真”:以事实为底线,以理性为主导

“修辞幻象是表达者为了实现预期所要达到的说服效果,通过语言修饰的方式给受众构建一种想象性的现实。它是与受众建成一种相互亲

近、相互信任纽带的有效途径,是达到理解和说服的最佳策略。”^{[10]导论58}为了引导受教育者能够形成预期的认知、情感,产生相应的行为,教育者的修辞表达总是按照教育者的意图和需要,而不一定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描述事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说是摆客观事实、讲客观道理,不如说是摆教育者话语中的事实、讲教育者所理解的道理。也就是说,用以教育受教育者的可能并非客观真实的事实及其道理,而是经过了修辞话语改装过的修辞性事实及其道理。经过修辞话语改装过的事实和道理具有了理想化、审美化的特征,因而有助于激发人们的情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但也容易对受教育者产生误导,使人陷入幻象世界,最终使人在真实世界面前彷徨失措,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怀疑和否定。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25]835-836}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一方面要以事实为底线。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的基本原则。话语修辞适应了思想政治教育审美化的发展要求,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但是修辞的审美意蕴绝不局限于言辞所制造的虚幻世界,而是以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方式发现和表达现实。从实际出发,摆客观事实,讲科学道理,才能使人真正信服。反之,则不仅不会产生信服,而且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信誉造成破坏。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既要发挥修辞的积极作用,激发受教育者的审美情趣,培养受教育者的审美想象力,也要注意其功能的限度,防止修辞制造的幻象阻断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不是为了模糊事实、掩盖真相、误导认知,而是为了以更加艺术、有效的方式揭示事实真相,以便帮助受教育者在真正占有事实的基础上把握道理,促进受教育者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形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

另一方面要以理性为主导。修辞幻象所具有的巨大魔力是语言对人的精神近乎“麻醉”的影响。其作用机制是用想象替代真实、感性消解理性。例如在广告修辞中,广告商通过制造和使用带有迷惑性、煽动性的话语,激发消费者的审美想象,模糊精

神世界与世俗世界的界限,诱导消费者在主观上建构出某种商品与满足由广告话语制造或参与制造的某种欲望或实现由广告话语制造或参与制造的某种价值之间的因果关系,刺激消费行为。对于陷入广告修辞所营造的幻觉时空的消费者而言,理性竟然神奇般地销声匿迹了,往往只有在经受了整个广告修辞以后才发现,自己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并为之而懊恼。懊恼是因为理性回归了,不过往往是以付出不必要的经济和精神损耗为代价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以情感人,更要以理服人,话语修辞可以作为点燃激情的“兴奋剂”,但绝不可成为消解理性的“屏蔽仪”。因为失去理性或缺乏理性的修辞话语可能是疯狂、危险和可怕的。

(二)“去隔”:克服言意矛盾,消解语言冲突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说道:“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而实际,无论作文或说话,又无论华巧或质拙,总以‘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为极致。”^{[26]2}“意与言会,言随意遣”可视作去除言难尽意和话语隔阂困境的极致境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要想趋近这种境界,就要努力克服和消解思想内容的丰腴性与语言表达的有限性、语言符号的公共性与私人性、语言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第一,提升思想与语言之间的契合度。使用恰当的语言和语言方式逼近本真的思想感情,需要不断增强教育者的修辞能力。一方面,教育者要尽可能地使用语义精准的语言。使用语义精准而非含混不清的语词是思维精准把握对象的必要条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准确表达思想感情,与受教育者有效沟通交流的基本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在话语修辞过程中,遣词造句要同客观事实及其概念严格对应,没有歧义,不能模棱两可、逻辑混乱,更不能偷换概念。另一方面,教育者要深刻把握和适当使用语用规则。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由于语境和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容易形成语用障碍和信息差,进而阻碍有效的表达和交流。为此,教育者要根据话语建构、语言环境、角色关系等方面的实际和需要,合理调整与修饰话语,直至达到“意与言会,言随意遣”的理想境界。

第二,保持语言的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适度张力。人类实践活动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特征,

决定了语言具有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属性。在交往活动中,语言的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表现出既相分离,又相吸引的状态。要想实现理想的修辞效果,既需要使用听话人能够听得懂的公共语言,也少不了使用恰如其分的个性语言,而且要使二者保持适度张力,如此方能保证交流的可能性,还能使交流充满盎然的创造性、审美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一个人决不能背离语言习惯太远,这显然是语言生活的基本事实。讲私人语言的人谁也听不懂,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说。但另一方面,一个人讲某种语言,该语言在词、句和风格的选用上完全依照习俗,那他的语言就失去了那种只与语言的词汇和交流方式相连的谈吐风度和感召力。”^{[27][67]}

第三,把握语言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辩证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科学话语与艺术话语水火不融。实际上,并非如此。话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可割裂看待,更不能相互否定,否则就会陷入言难尽意的困境和言不尽意的深渊。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的认识和实践中,存在过于强调艺术话语的功能的现象,把艺术性语言置于不恰当的位置,给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同时,把科学话语排除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的视野之外,似乎科学话语总是灰色的,无缘于美学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和遗憾。合理的做法是,使话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形成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态势,既让科学话语富有更多的艺术气息、审美趣味,也让艺术话语能够体现逻辑的力量、理性的光辉。

(三)“降蔽”:坚持修辞明理,促进话语融合

修辞具有澄明的功能,但这种功能同时也受到其遮蔽功能的挤压。思想政治教育在应对修辞悖论及话语遮蔽难题时,总是不断地遇到来自语言本身及语言运用的种种限制,导致遮蔽现象始终难以根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束手就擒,至少我们可以在一些方面设法降低其遮蔽的程度,最大限度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的功能与价值。

第一,坚持修辞明理的基本话语指向。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文化中,诗性话语始终占据主导地

位。近代以来,在科学主义的推动下,理性逐渐取代了诗性,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话语方式。这固然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是随着理性主义和理性话语弊端的逐渐暴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理性主义和理性话语展开反思与批判,同时呼吁诗性和诗性话语的回归。在此过程中,诗性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诗性话语的重建也受到学界的关注。不过,我们也应该对诗性话语修辞可能带来的遮蔽效应保持必要的警惕。其一,诗性话语修辞不能以消解理性话语为代价。历史上,许多理性主义者,如黑格尔,贬低诗性思维和诗性认识的观点已在实践和历史中被证伪。当然,倡导思想政治教育诗性话语回归,亦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避免诗性话语的误用、滥用及其对理性话语的消解。其二,诗性话语修辞要围绕“明理”发挥优势。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诗性话语修辞不能仅仅停留在创造形式的美感,更要发挥其隐喻性认知优势,通过使用诗的语言,在受教育者那里制造由此及彼的联想与想象,表达“弦外之音”。思想政治教育一切话语修辞艺术的运用都要围绕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这个基本指向而展开。因而,围绕“明理”进行的话语修辞,越是高超,说理才能越是深刻、透彻、灵活;否则,文辞修饰越是华丽,就会越流于肤浅,坠入空洞。

第二,促进理性话语与诗性话语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和目标上内在地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在普遍性、规律性、本质性上说明一个思想“是什么”;一个是从显处、此处到隐处、彼处去理解一个思想“怎么样”。“是什么”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依靠理性话语开展的理性教育活动,“怎么样”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凭借诗性话语开展的诗性教育活动。一个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既要从理性上把思想讲得深刻、透彻、严谨,又要在诗性上把思想讲得生动、活泼、敞亮,富有想象。这就需要理性话语与诗性话语的融合共生。其一,针对不同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环境和受教育者的具体情况,话语修辞方式既要有所侧重,又要相互配合。例如,在课堂教学中可偏重使用更具逻辑性、说服力的理性话语,而在相应的现场教学中则要较多地使用更具想象力、感染力、亲和力的诗性话语。其二,促进理性话语与

诗性话语的相互渗透。在理性话语中适当使用具有诗性意味的语辞和表达方式,以增加理性话语的艺术韵味,也可以在诗性话语中合理运用富有理性意味的语辞和表达方式,以增加诗性话语的理性力量。只有当我们不再简单地满足于单一修辞话语的功能与价值,而是将理性话语与诗性话语结合起来时,我们才能消解修辞悖论,走向思想政治教育澄明的证明。

参考文献:

- [1] 冀昉,主编.左传(下)[M].北京:线装书局,2007.
- [2] 陈大齐.孟子的明理思想及其辩说实况[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 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3-29.
- [4] [苏]B.A.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M].蔡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
- [5] 陈望道.陈望道修辞论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 [6] [梁]刘勰.文心雕龙[M].郭晋稀,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
- [7] 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 [8] [美]肯尼斯·博克,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M].常昌富,顾宝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9] 王一川.语言乌托邦——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 [10] [美]大卫·宁,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M].常昌富,顾宝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11]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12] 吕叔湘.语文常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 [13]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M].李康,李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14] 刘禹锡选集[M].吴汝煜,选注.济南:齐鲁书社,1989.
- [15] 郑庆笃,选注.中国历代诗歌精选(唐诗卷)[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7.
- [16] 徐益亮.意蕴、难题、任务:思想政治教育的诠释审思[J].思想教育研究,2021,(8).
- [17] 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 [18] [苏]巴甫洛夫.巴甫洛夫全集(第Ⅲ卷)[M].赵壁如,等,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 [19]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0] 张世英.艺术哲学的新方向[J].文艺研究,1999,(4).
- [21] 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与法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 [2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3] 老子.道德经[M].张景,张松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1.
- [24] 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修订本)[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 [2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6]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 [27] 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M].邓安庆,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李基礼]